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5.02.024

## 论 18 世纪伦敦现代消费市场的形成

曹瑞臣

(菏泽学院 社会科学系, 山东 菏泽 274015)

**摘要:**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在消费领域悄然发生了一场“消费革命”,推动英国走向近代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18世纪英国伦敦以其政治、商贸、经济、时尚消费中心地位最早形成地方消费市场,成为名符其实的消费之都。探究近代伦敦消费市场的兴起,以需求刺激供给,带动经济发展,对于当今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拉动内需型经济转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18世纪英国;消费市场;消费革命;伦敦

**作者简介:**曹瑞臣(1976-),男,山东潍坊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菏泽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从事英国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5)02-0089-06 **收稿日期:**2014-10-30

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预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出现。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大众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时代来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现代性是指一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影响以后的世界。根据他的理解,现代性就是工业化的世界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sup>[1]</sup><sup>14</sup>哈佛大学杜维明老先生对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作了界定:现代性是一种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以日益复杂的制度和日益发达的媒体激励、劝诱人们以努力赚钱、及时消费的方式追求人生意,其价值导向是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而深深影响现代制度建设和价值观变迁的是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两者的实质却是物质主义。<sup>[2]</sup>笔者将以英国首都伦敦地区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兴起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探寻现代性在伦敦的孕育与展示,揭示消费市场形成的内部动因,在引领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城市化,引领英国消费时尚,推动消费革命的发生和消费社会的兴起过程中起了巨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 一、近代英国消费革命与消费社会

18世纪60-7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英国经济实现腾飞,逐步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成

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为现代消费革命和消费社会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在工业革命发生原因上,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跳出传统解释的窠臼,提出“消费需求理论”(Demands),以全新的消费视角来重新审视工业革命发生之谜。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在解释工业革命原因时谈到了18世纪消费主义盛行和民众“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大兴现象,认为消费革命是存在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消费主义的盛行对推动工业革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8世纪初期出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也使大量海外商品如潮水般涌入欧洲各国市场,民众为了购买新兴消费品开始狂热地乃至不择手段地增加收入,这些现象逐渐在文化层面产生了一种刺激,最终推动了工业革命闪亮登场。<sup>[3]</sup><sup>20</sup>克里斯托弗·戴尔(Christopher Dyer)教授在对中世纪晚期转型时代英国消费与投资研究中指出,在现代消费史上,众人皆知且研究较透彻的事件是18世纪的“消费革命”的确定性。<sup>[4]</sup><sup>123</sup>在所有论著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当属英国现代学者尼尔·麦肯德里克、布鲁尔和普拉姆(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J. H. Plumb)三位学者的联合力作《消费社会的诞生:18世纪英国商业化进程》,他们一致认为“18世纪的英国发生了一场‘消费革命’”,同工业革命一样重

要。不仅如此,他们认为英国已经迈向商业化社会,将英国深深卷入消费型社会。麦肯德里克在调查了18世纪英国社会时尚的商业化现象,指出消费领域中出现“时尚革命”(Fashion revolution)。此外首都伦敦城市的消费、时尚中心地位扮演了重要的消费辐射功能角色,通过伦敦社交季、各种展览会、伦敦商铺、贸易名片等形式促进消费,此类新的消费模式前所未有。<sup>[5]34-41</sup>可见在麦氏的研究中,一个现代性十足的英国已经出现,人们对物质和消费的狂热追求,正在创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财富观和消费观主导着现代社会的运行,而现代传媒和商业广告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消费体验和视觉冲击,日益将人们拉入消费品包围的世界。

著名美国学者麦克拉肯(McCracken),也肯定了麦肯德里克关于18世纪英国发生“消费革命”的说法,认为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麦肯德里克在内都把导致近代西方社会重大转型的“工业革命”和“消费革命”看作是重要标志。在这样的一种消费社会中认为“消费革命”代表的不仅是人们的消费体验、消费喜好和购买习惯的改变,而且是现代世界早期文化上的根本转向。<sup>[6]3</sup>经济社会史学家戴尔(Christopher Dyer)教授认为近代英国消费主义、消费社会的兴起源于中世纪晚期,并指出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在向近代转型时期消费领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根据18世纪经济行为活动得出近代消费社会四大特征:第一,18世纪早期或1700年前的几十年里,人们收入增加,如伦敦商人和工匠。第二,社会流动进入新的阶段,慢慢地消融了旧的等级制度。第三,商人和制造商通过为社会提供更多奢侈品来刺激需求,如纺织品和陈设品,进口更多的与生活方式有关的茶、咖啡、巧克力等商品。第四,强烈的个人主义和隐私观念的出现、革新与迅速变化促使新的消费主义形成。<sup>[4]123-126</sup>消费革命和消费社会的兴起,18世纪在英国历史上起着重大作用,对于工业革命的启动和现代性价值观的倡导具有重要意义。

## 二、伦敦现代消费市场的形成

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是欧洲现代化程度最高,也是欧洲各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最成功的国家。18世纪中后期英国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型,伦敦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在推动消费革命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世纪的伦敦,

作为政治、经济、商贸、金融、文化娱乐中心,不仅是英国第一大城市,而且也是欧洲第一大都市,是欧洲乃至世界城市化率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1600年伦敦人口仅20万,1700年人口达57.5万人,1750年人口67.5万人,1800年人口达到95万,约占英格兰、威尔士总人口的1/9。<sup>[7]44-70</sup>作为经济增长极的伦敦在英国物质财富增长、日用品消费、奢侈品消费等方面成为英国生产与消费市场的标杆,其区域性消费市场的形成和兴起对于伦敦城市的生产与技术革新乃至工业革命的启动都具有重要意义。究其现代消费市场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促成的。

### 1. 伦敦商贸、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

消费社会的出现离不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需求,伦敦现代消费市场的形成对全国消费市场的带动和影响至关重要。光荣革命后,英国迈向商业化国家。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伦敦创造了民族市场,也由民族市场所创造,英国的繁荣兴盛在于伦敦。他引用汤因比的话:“在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里,没有一个城市能使所有其它城市同样彻底黯然失色,17世纪末英国人口与法国或德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也少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但那时伦敦很可能已经是欧洲最大城市。”1700年伦敦的人口大约55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当深受内战之苦的法国在巴黎和里昂两大中心之间摇摆不定之时,英国只有一颗脑袋,但硕大无比。<sup>[8]438</sup>作为全国最大的贸易市场集散地,伦敦自然成为了民族经济的核心,汇聚着全国最大的物质财富和权势,是欧洲最大、最繁忙、最富有的现代化都市。

伦敦财富主要来自商业贸易。正如布罗代尔眼中的伦敦魅力:伦敦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是一个极其活跃的港口(占英国对外贸易额的4/5),又占据英国生活的顶峰;作为一台寄生的、制造奢侈浪费的,也是创造文化的庞大机器,伦敦较巴黎有过之而无不及。18世纪以来英国享有进出口货物的垄断权,因此能够轻松地控制岛上所有产品以及转销业务:首都对于全国各地而言,就像是铁路的中央编组站,一切商品运抵伦敦,然后再从伦敦运走,或运往国内市场,或国外市场。<sup>[8]440-441</sup>来自伦敦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初的一份进口货物清单显示,1700—1701年伦敦进口印花布价值3.67万英镑,占进口额的7.9%,糖和糖浆占总额的11.3%,烟草占3.4%,丝绸占4.5%,生丝占7.4%,水果占2.9%等。<sup>[9]124-125</sup>从伦敦进口货物详尽清单可以看出:17世纪中叶部分商品进口量很少,甚至没有列

人需求详单,但是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期成为伦敦社会需求量极大的消费品,如来自东印度的印花布、北美洲的烟草、欧洲的木材等。一方面进口商品量上的激增,反映了自17世纪以来往往被视为少数有社会地位、有钱人奢侈品的物品,如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印度的棉布、印花布、来自土耳其的咖啡、西印度的蔗糖等到18世纪开始成为更多英国人的日用消费品,工业革命后走向大众化消费,当然伦敦对这种消费品需求的大增与作为强有力的消费群体富有的伦敦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关系。此外进口量的增加也表明18世纪后的伦敦人口有了较大增长,英国人收入的普遍增长,有了较强的购买力,本国物品已经满足不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海外商品特别是奢侈品需求强烈,当奢侈品消费在近代完成“去道德化”后,人类对物质的追求、消费和享受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进入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农业、商业、工业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伦敦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昌盛的典范。

## 2. 伦敦消费市场与消费中心的形成

城市是诞生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18世纪英国城市化进程是欧洲最快和最高的。伦敦快速城市化进程推动了消费市场的形成。里格利(Wrigley)对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各国城市化率(1500—1800年)比较研究后认为,从居民人口超万人城镇占全国总人口比率看,1500年英格兰城市化率是3.2%,西北欧为6.0%,欧洲为6.1%,1650年英格兰城市化率10.8%,西北欧10.7%,欧洲9.3%,1700年以前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各国相比城市化没有优势;但是到1700年以后开始超越西北欧和欧洲,至1750年远远领先于西北欧和欧洲大陆,英格兰城市化率17.5%,西北欧仅为13.8%,欧洲大陆为9.9%,到工业革命后的1800年英国城市化率达到24%,为欧洲之冠,而西北欧和欧洲大陆都没有显著提高,分别为14.7%、10.6%。<sup>[10]59</sup>伦敦是18世纪英国城市化之冠。1700年伦敦人口占英国总人口的1/10左右,到1750年、1800年伦敦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9左右,迈入世界人口百万都市行列。工业革命后,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资金、技术等开始持续向工业城市流动,而伦敦以其他地方城市所不具有的优势在人口吸引、财富积聚、工业制造、发明创新等方面继续领跑全国,形成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

伦敦财富中心和消费中心地位的形成。伦敦作为政府所在地,唯一银行业、出版业中心,同时也

是各类职业群体的主要聚居地,不仅控制了英格兰3/4的对外贸易,而且还控制了几乎一半的全国商船队,伦敦的商人、零售商等较全国其他城市商人更加富有,具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劳动者集中地,拥有全国最广阔的消费市场。伦敦除了拥有发达的商业和贸易之外,还是生产、发明、创意中心。18世纪著名文人笛福将其比喻为“英格兰的心脏”,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食品加工师,原材料和各类制造品,在伦敦内部非配、消费或是转口外地。<sup>[9]18</sup>18世纪的伦敦是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据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估计,伦敦国民财富的1/4花费在服装上,因此纺织和服装制造业是伦敦最大的行业。第二大行业为建筑业,如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伦敦重新建造了9000栋房屋。第三大行业是金属制造和皮革制造业。这两个行业技术更加复杂、分工更加专业化和精细,每个行业雇工约10000人。罗伯特·坎伯(Robert Campbell)1747年发表的伦敦工匠指南《伦敦商人》(London Tradesman)列举了200多种手工业种类。金属制造业如锁具、钟表、时钟、枪支制造等。此外还有木材加工业。第四大行业含面包烘制、造船业等,如1702年伦敦拥有英国造船吨位的43%,占了近一半。第五大行业中有酿酒业、蒸馏业和玻璃器皿制造业,肥皂、蜡烛、烟草提炼、炼糖厂、印刷业和出版业等,所有这些行业几乎主导了英国全部的生产。酒类包含杜松子酒、啤酒生产。18世纪英国饮酒成风,乃至成为恶习,消费量从1680年的50万加仑到1740年代的800万加仑。酒类的巨量消费带动了玻璃器皿业的发展,包括酒杯、瓶子、窗户玻璃、镜子等大众消费品以及科学仪器等。最后一个大行业是陶瓷制造业。<sup>[11]22-25</sup>伦敦产品不仅供给伦敦本地消费需求,而且运销全国各地。伦敦的各类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满足了伦敦本城的生产与人口消费需求,从而减少运输成本,进一步刺激了伦敦的经济发展。

就日常生活消费而言,伦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再加上其政治、商贸中心地位,全国各地都围绕伦敦提供服务。人口自1700年的57.5万膨胀到1801年的90万,每天都消耗着巨大的资源,包括饮用水、燃料、食品以及各类其他生活必需品,当然还包括富人们的各类奢侈品消费。仅在1725年伦敦就消耗面粉369,000夸脱,60000头小牛,70,000只绵羊和羊羔,187,000头猪,52,000头乳猪,115,000蒲式耳牡蛎,14750,000只鲭鱼,

1398 船的鳕鱼、黑线鳕、芽鳕鱼,16366,000 桶黄油,21066,000 桶奶酪,500 万加仑牛奶,475000 查尔特隆燃料煤,更不用说外加 1970,989 桶啤酒,30,000 吨葡萄酒,11200,000 加仑烈酒(威士忌、杜松子酒等),还有多达 22,639 匹马的干草和燕麦草料等。<sup>[12]20</sup>正如英国大文豪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其《不列颠旅行记》中所描写的,整个王国,所有的人们,一切土地甚至是海洋,在王国的每一个部分,都被雇佣来向伦敦供给货物,我还可以再加一句,供应伦敦最好的生活物资,我的意思是这些生活物资包括谷物、肉类、黄油、奶酪、食盐、木材以及服装等,建筑材料、生活家具等。<sup>[12]21</sup>

伦敦交通运输网络的不断改善推动了伦敦消费市场的繁荣。从笛福游记中的描述看,伦敦几乎所有的生活食品以及建筑材料均来自伦敦以外的其他地区,而且消耗量巨大,这就需要伦敦有发达的交通网络通往全国各商品产地,以便于将伦敦所需消费品及时运进,伦敦造的各类商品及时运出,供给全国。不过伦敦虽然有发达的商业和贸易,但是即使到了 18 世纪初期伦敦市区交通仍旧不够完善,道路状况糟糕,交通拥挤,不利于货物运输。<sup>[12]22-23</sup>实际上自 17 世纪后半叶以来有关交通运输改良的呼声在英国不断得到重视,英国在 18 世纪进行了一场“交通运输革命”,主要体现在收费公路(国会授权各地贵族、商人、企业主成立信托公司,负责建设和维护,并征收路费,经济收益属于信托公司,是现代高速公路的前身)建设和内河航道的修建上。在 1760—1809 年之间大约有 1514 项涉及收费公路的法律通过,所有这些都大大改善了伦敦通往外地的道路交通状况。不过海运和内河航运依旧是主要交通渠道,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手段和道路网络保障了伦敦的各种物资供给不受影响。1750 年收费公路迅猛发展,里程由 3400 英里猛增到 1770 年的 15000 英里,1836 年达到创纪录的 22000 英里,占据全国公路里程的 1/5。生产与消费之间最重要的环节是流通,工厂里堆积如山的产品最终为人们所消费,需要便利、快捷的交通手段和条件,以最经济高效的方式运往各商业、消费中心,包括陆路、水路,在铁路时代之前陆路最重要的途径是便利的收费马路,水路则主要依靠运河和内河航道运输。18 世纪 50 年代标志着运河时代的来临,新修建的水道贯通了内河航道,也把矿区与矿产产品市场连接起来,1750—1820 年之间,在原有的 1000 英里航道基础上,新修航道 3000 英里(以运河为主),总计耗资 1700 万镑,将

主要的生产与消费中心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达各主要港口。<sup>[13]172</sup>至此英国以首都伦敦为核心,拥有了连接各矿区、生产要地和主要消费中心的发达的内河运输系统和收费公路系统,这对于全国统一消费市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 3. 伦敦文化娱乐和服务业市场的形成

作为文化教育、艺术和娱乐中心。伦敦是典型的文化、艺术中心,自伊丽莎白以来,文艺复兴在英国高涨,而伦敦则是重镇,文学、艺术繁荣,戏剧发达,剧院兴盛,成为市民最重要的娱乐场所。只不过 16—17 世纪剧院的观众多为达官贵人,有钱人士才能消费得起,甚至伊丽莎白女王也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迷。至 18 世纪有着浓厚艺术传统的伦敦,戏剧依旧受伦敦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作为最受伦敦人欢迎的娱乐消遣方式之一,日益为富有的中产阶级人士所接受,剧院也成为中产阶级人士接受文学、艺术熏陶的好去处和娱乐消遣场所。在 18 世纪初期伦敦最有名气的剧院是位于西班牙路的林肯客栈剧院,还有德鲁里胡同(Drury Lane)的皇家剧院(Theatre Royal)。

19 世纪初期英国加速向工业社会转型。1801 年不列颠本土有 30% 的人居住在城市,有 21% 的人生活在超过 1 万人的城镇中。而伦敦人口达 110 万,占全部城镇人口总数的 1/3。<sup>[14]183-184</sup>工业革命中以企业主、商人为主的精英和乡绅为主的农村精英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势力崛起,成为社会中最富活力、最有创新精神的社会阶层,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现代文明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业革命不仅使社会组织管理和企业管理变得更加细化和复杂,而且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海外争霸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繁杂精深的各项事务都要求这些脑力劳动者高度的专业水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社会服务行业的兴起和专业人员的大量涌现,既是重商主义时代积累的结果,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需求的产物。在 18 世纪划分行业和职业的方式多样,或根据人们的财富和收益状况,或依据社会地位,或行业的技术程度,还可以从所从事的行业的服务类型,空间地理分布,或是所从事职业对经济发展或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来划分。譬如 18 世纪大贵族、乡绅阶层地产经济的繁荣都加大了地产庄园对各种服务人员的需求,包括建筑师、园丁、土地工程测量人员、土地代理人,地产管家甚至是教师、牧师、医生、律师等,更何况那些经营商业贸易富比王侯的大商人更有经济能力来支付一些服务行业消费。此外,社会经济活动的

复杂性增强,需要社会提供新型服务。律师可以促进国际贸易,通过在议会和地方的活动来开拓有争议河道的航运业务;专职的地产管家可以利用科学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地租和增加产量;海关人员精通税则,教师可以指导青年学习数学、簿记和会计、书法和测量等等。大量的专业人群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市场潜力巨大,对于推动伦敦消费市场和消费中心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就服务业的发达状况,如1704年,伦敦仅药剂师就有1000人之多,比1500年大约增加了10倍。<sup>[15]266</sup>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伦敦社交季(London Season)的盛行带来了巨大消费市场和需求,带动了社会中上层消费市场的日益壮大,推动了消费社会的到来,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贵族阶层及其乡绅、各级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以及城市中产精英等人士参与的社会交际和娱乐活动。在交际活动期间,上层人士或贵妇热衷于在伦敦购买各种新潮服饰、新奇事物、享受精美饮食等,由此形成一个高端消费市场,包含各类最新潮的时尚、奢侈品消费等。18世纪英国政治氛围的宽松,首都伦敦的开放与包容,让这座现代气息的大都市充满了无限生机与活力。社交季在查理一世时期就已出现,18世纪后固定在每年的10月到来年的复活节期间,基本在4月份。气势恢宏的展览不仅吸引人们对时尚之都伦敦的关注,还确保社交季期间他们带来的随行人员和家仆带回令人兴奋的、最时尚的消息。从伦敦社交季带回英国各地最新的时尚信息成为地方时尚风向标。一位作家在1756年的《鉴赏家》(Connoisseur)中提到,新潮服饰传播如此之快,以致能根据他们距离伦敦的远近追踪服饰款式的细微变化,仅仅一次的伦敦之行就能带回如此令地方人惊讶的、兴奋的时尚信息。<sup>[5]74</sup>18世纪英国发达的商业和贸易,殖民帝国的视野,海外各类新潮奢侈品、各类食品、工艺品大量涌入英国市场,在重商主义思维的背景下,新的消费理念、消费模式以及消费偏好逐渐形成,不仅带来消费革命,而且为工业革命的启动创造了巨大消费需求和大众市场。英国当代历史学家马丁·当顿(M. J. Daunton)引用纳撒尼尔·福斯特(Nathaniel Foster)对18世纪英格兰的一段描述(1767年):英国的各个社会阶层彼此不自觉地进行上下流动,这样一种模仿之风存在于各阶层中,较差的阶层会努力向高一层努力,这一时尚状态已经失控,而且时尚性奢侈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播开来。纳撒尼尔的描述让很多史学家肯定18世纪发生了一场

消费革命,标志着一种空前的消费倾向。<sup>[16]361-364</sup>

#### 4. 海外奢侈品消费时尚中心

作为现代化大都市,伦敦在海外奢侈品消费上引领全英国时尚潮流,在海外奢侈品茶叶和咖啡的引入与传播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英国奢侈品消费风潮自伦敦开始,日益形成了与传统社会迥异的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消费日益成为一种象征和符号,一种财富、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18世纪引领伦敦和英国消费市场的两大软饮料茶与咖啡,成为英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特别是正在崛起中的人数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喜爱饮品,以各类奢侈品消费为主导,工业革命前后形成一个人数庞大的、具有强大社会购买力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消费主体主要为贵族阶层和中产阶级群体。众所周知,英国茶叶来自东方的中国,最初作为皇家饮品,属于典型的奢侈品。根据历史记载,东印度公司1664年下了第一笔茶叶订单,从爪哇运回100磅中国茶叶,1690年进口38390磅,1699年为13082磅。进入18世纪茶叶以其特质与保健功能逐渐为英国人所接受,其消费量和需求以惊人速度猛增,与咖啡饮料一道成为英国最重要的两大消费饮料。1721年茶叶进口1241,629磅,1750年高达4727,992磅,在1784年茶叶《抵代税法》(Commutation Act)降低茶税之前的10年中,东印度公司共进口中国茶叶54506,144磅,年均500余万磅,而到18世纪末的最后10年中,每年进口中国茶叶突破2000万磅,东印度公司共进口中国茶叶228,826,616磅。<sup>[17]20,27</sup>到19世纪初期茶叶已经成为价格低廉的大众普通消费饮品。

当然整个18世纪英国社会对来自中国的奢侈品茶叶的狂热需求,是在欧洲兴起“中国热”大背景下出现的,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热”推向高潮,中国的瓷器深受英国中上层人士喜爱,外销瓷在中英贸易中仅次于茶叶贸易。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中国瓷器每年多达一百万件,仅1777—1778年有8艘货船运到英国的瓷器就达345吨。<sup>[18]56</sup>英国社会对茶叶、瓷器的狂热需求和大宗消费,有利于中国积极参与到世界贸易体系中来,为封闭的清代中国经济打开了一扇开放的窗口。

消费饮品除了茶叶之外,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咖啡,由垄断地中海贸易的利凡特公司主导。咖啡最早由英国商人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引入,1652年伦敦开设英国也是基督教欧洲第一家咖啡馆获得巨大成功,伦敦中产阶级很快喜欢上这种黑色饮

料,10年后伦敦已经有82家咖啡馆。到18世纪以后伦敦数以千计的咖啡馆出现,两种非酒类消费饮品咖啡和茶叶逐渐放下身价,成为英国普通民众的消费至爱。伦敦咖啡馆消费盛行,英国独特的公共空间和咖啡文化开始形成。17—18世纪伦敦咖啡馆不仅是谈论新闻、评论时政、交易股票、买卖生意、消遣时光的好地方,而且也成了商人、科学研究者 and 知识分子的天然家园。咖啡馆也是英国人自由民主精神得以孕育的地方,一度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咖啡馆被政府指责为鼓励政治分歧和反叛思想的场所,于1675年12月贴出皇家公告《禁止开设咖啡馆的公告》,伦敦咖啡馆经营商于1676年1月后不得再销售“咖啡、巧克力、冰冻果子露和茶”<sup>[19]96-97</sup>。根据1739年历史学家梅特兰在其《伦敦史》中准确调查了首都咖啡馆数量和位置,认为在有着50万人口的伦敦有551家咖啡馆,当然咖啡馆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城市精英阶层。<sup>[19]200-202</sup>在17—18世纪之交,伦敦作为欧洲最大和咖啡馆最流行的城市,开始享誉整个欧洲,伦敦在城市规模、人口、财富三个方面远远超越了古罗马。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和权势、名利场所在地,社会名流云集之地,伦敦庞大的消费市场,现代的消费观念能够提供人们所需、所享受到的一切,犹如功能强大的火车发动机,引领英国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正如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诗人、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曾经观察到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也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伦敦有生活能赋予人的一切。”

**结语** 第一个消费社会自英国开始,研究它的源起,对于理解现代消费社会理论和现实具有重大意义。自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以伦敦为中心的地方市场和城市经济,在近代以后更加发达,以其开放性、现代性、包容性之品质逐步发展成为发达的商贸、金融、文化、娱乐、时尚之都。伦敦既是创造财富之都、生产和创意中心,同时也是消费之都、奢侈之都,最早形成奢侈品消费市场和大众消费市场。在伦敦消费革命、消费市场形成过程中,一个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在引领消费时尚、推动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兴起中起了重大作用。近代英国消费领域的重大变化预示着工业化和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物质狂欢和消费盛宴,工业经济主义、消费物质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

明进步。通过对伦敦现代消费市场的分析,对研究消费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重大的标杆意义。在反思现代消费社会和现代性的同时,对于当今正在迈向消费社会的中国而言,既要看到优化社会结构、积极培育中产阶级力量的重要性,又要看到实现经济结构深刻转型的迫切性,应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提升为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活力的根本动力。

##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 杜维明,卢凤. 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3] 罗伯特·艾伦. 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M]. 毛立坤,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 [4] 克里斯托弗·戴尔. 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M]. 徐浩,莫玉梅,译. 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5]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6] Grant McCracken.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Consumer Good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7] E. A. Wrigley. A simple Model of London's importance in changing English society and Economy 1650 - 1750: Past and Present [J]. No. 37 (July, 1967).
- [8] 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M]. 施康强,顾良,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9] A. L. Beier, Roger Finlay. London 1500-1700: the making of the metropolis [M].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86.
- [10] Wrigley. 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1] 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M]. Oa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12] George Rode. Hanoverian London 1714-1808 [M].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1.
- [13] 卡梅伦(Cameron. R.), 尼尔(Neal. L.). 世界经济简史——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M]. 潘宁,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14] 哈维,马修. 19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M]. 韩敏中,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 [15] 钱乘旦,高岱. 英国史新探[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6] M. J. 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00 - 1850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7] 罗伊·莫克塞姆. 茶:嗜好、开拓与帝国[M]. 毕小青,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0.
- [18] Maxine Berg. 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9] 马克曼·艾利斯. 咖啡馆的文化史[M]. 孟丽,译. 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焦玉奎]